

# 西安事变期间张杨八字宗旨之再探讨

房成祥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国内外史学界都重视这个课题的研究。但是，究竟如何解释这次事变？如何评价张、杨和中共在这次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解释这次事变与整个中国历史的联系？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看法往往大径庭。有一种观点认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没有主见，束手无策，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主要得益于中共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拙著《西安事变史话》一书中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强调，张杨二将军始终是西安变事的领导者，而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是“协助”、“调停”。为了阐明这个观点，笔者在西安事变50周年时，曾撰写了《论西安事变期间张杨的八字宗旨》，本文仍围绕这个中心，对和平解决西安变事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再探讨。

## 一 八字宗旨的形成及其历史的客观性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张杨以特殊的手段发动西安事变，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分不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面对民族危亡的形势，张杨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程度反映出爱国主义思想。

张学良是爱国主义者。早在1927年他写给在日本学习的二弟学铭的信中，就充满着爱国激情，要求二弟“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sup>②</sup>。他自己公忠体国，励图国家的统一富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受南京最高当局的影响，开始以为可能是如南京方面所说的地方事件，希望事态不扩大，又过高地估计英美出面调停的可能与份量，对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寄以很大希望，依赖国联。所以，在南京最高当局严令不准抵抗的情况下，他致电张作相等：“务仰严饬所属，对此事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于事无益”<sup>③</sup>。及至国联调查团毫无作为的离去，日军进占辽西走廊后，他方知东北大势已去。丢失东北有复杂的原因，但毕竟是日本从东北军手里用武力夺去的，张学良难辞其咎。他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又不甘将国土拱手相让，所以组织王以哲等部在长城线上阻击敌人，使战局趋于稳定。

杨虎城也是爱国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9月23日，杨虎城发表泣告全国书，历数日本侵略我国痛史，谴责日本“无端称兵，侵占辽宁”，呼吁“全国同胞，栗闯墙御侮之训”，“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并表示“职司

卫国，枕戈待旦”<sup>④</sup>。杨虎城披沥陈词，其爱国之忠心昭然若揭。

特别应该指出，张杨的爱国思想，救国愿望，随着祖国危机的加深，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勃兴，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而与时俱进。

其一，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向中国本部进犯，要占领全中国。1936年9月，日本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出所谓中日合作的亡华七条件。11月，日本帝国主义再次策动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中国不是抗战就是亡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抉择。张杨的抉择是发动对日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检讨了“九一八事变”时的错误。表示“过去的错误，我们不能不察明，不能不承认”<sup>⑤</sup>。并下定决心，“决不再蹈‘九·一八’事变时委曲求全的覆辙”，“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绝不干！”<sup>⑥</sup>为了实现他夺回东北、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他多次向蒋介石谏。绥东抗战爆发后，还向蒋呈送《请缨抗敌书》。张将军的思想、愿望、行动正如他在《请缨抗敌书》中所说：“半载以来，良屢以抗日救亡理论与策划，上读钧听”，“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sup>⑦</sup>。杨虎城将军在理在势在史均愿参加抗日。绥东抗战爆发后，在11月28日发表的《告民众书》中号召大众“要拼命的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并决心“御侮争存”<sup>⑧</sup>。上述事实说明，张杨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都想挽救民族的危亡。尽管他们语句和提法不同，性格各异，但在寻找中国出路的问题上，勇于追求，勇于奋进，却是完全一致的。

其二，当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西安地区群众运动的勃兴，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各方停战，建立抗日联合战线。9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会相继成立，西安民众运动如火如荼，民众的抗日救亡要求推动张杨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迅速前进。1936年10月初，张学良将军在西安接见伦敦《先驱日报》记者开斯托夫人，当他回答问及的“现在中日关系呈现紧张，中国政府将如何应付”时，答道：政府是“建立在民意之上”的，应该“遵从民意”<sup>⑨</sup>。说明张杨与人民声息相通。可是，南京政府为了破坏救亡运动，竟于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12月9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听到学生请愿的消息，竟要“以武力弹压”，“以机关枪扫射”<sup>⑩</sup>，镇压学生救亡运动。这两件事，使和人民命运与共的张杨将军无法容忍，导致了“兵谏”的发生。如张学良所说，这两件事，是采取“兵谏”办法的“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sup>⑪</sup>。

其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中共中央设立了白区工作委员会，为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全国的救亡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重大步骤。特别是对进攻红军受到重创而又有条件争取的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和他们本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红军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这对于复土还乡的愿望深深埋心中的东北军来说，如同一颗随时可以发芽的仇恨的种子，遇到了适宜的气候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并开始感到“剿共”莫明其妙，继而认识到红军是朋友。只有联共抗日才

能使祖国独立解放，才能打回老家去。用张学良的话来说，中共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实攻我心”，“实有动于我心”<sup>②</sup>。

由于上述种种条件的作用，到西安事变前夕，张杨逐渐形成了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因为张杨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受制于南京政府，所以，他们一方面在西北地区实施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又不能公开表示自己的进步思想和爱国主张。正如张学良将军12月13日在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所说：“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sup>③</sup>。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同南京方面形成公开对峙的局面，张杨才能无所顾忌的公开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通过各种形式反复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2月13日，张杨《对时局通电》中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sup>④</sup>。15日，杨虎城在《广播词》中表示“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sup>⑤</sup>，12月16日张杨《告将士书》中强调：“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sup>⑥</sup>；他们在反复宣传这个“政治主张”的过程中，有时又称为“救国意见”、“救亡主张”、“政治意见”或“爱国主张”。后来，随着张学良将军陪蒋赴宁后形势的发展，杨虎城将军将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发展提出的政治主张简化为“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对内和平”“对外抗日”，“求对内和平”“求对外抗日”及“对内和平”“对敌抗战”等。1937年2月4日，杨虎城发表《对事变解决真相宣言》，明确地将其概括为“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他说：“此间去年‘双十二’之事，旨在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sup>⑦</sup>，有时他还把这个宗旨简化为四个字，即“救亡图存”或“救亡要图”。周恩来在1937年1月10日致张学良的信中说这也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他写道：“兄（指张学良）在此（指西安）时所谈之……一贯方针”即“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可见，中共代表团当时也承认这八个字是张杨的宗旨。

研究西安事变的历史，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对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这就是西安事变历史的客观性。

## 二 八字宗旨的历史作用

八字宗旨的历史作用怎样？从历史的角度与当代的眼光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它的意义？简言之，它是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主意所在，也是他们处理西安事变中各种问题的基本准则；它的实施，使我国连绵十年之久的内战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国内和平，实现了国内阶级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过渡，无可置疑，这是一个积极而重大的历史作用。

第一，西安事变所以能爆发，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西安事变的前夜，我国正处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张学良、杨虎城主张团结抗日，提出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宗旨。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两种政治主张的冲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日矛盾的上升而逐渐激化，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对部下讲话时说：这种“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已经“无法化解”，“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矛盾急剧地表面化。杨虎城在市民大会上讲演时也说：“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因有见于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了多次的劝谏无效后，于万不得已才有这次的兵谏……”。可见，张、杨发

动兵谏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手段。然而也正如张、杨在告将士书中所说：这次“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是“酝酿了许久”的<sup>⑧</sup>。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宗旨，即逼蒋联共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原来都是地方军阀首脑。他们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而中日民族矛盾又在不断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走过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终于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主张，即救亡图存的宗旨。并逐步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能救亡图存。于是他们把红军从敌军变成抗日的友军，并分别与红军秘密停战，形成三方面的联合，走上联共的道路。

1936年11月，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下，奋起抗击日军和伪军的进攻，张学良、杨虎城为支援绥东抗战，曾请缨杀敌，但均被蒋介石拒绝。12月4日，蒋介石乘专车抵达西安。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张杨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拒绝剿共，并多次向蒋净谏，但都遭到失败。12月29日，杨虎城在《函各县长述双十二事件之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号以今后施政之方针》中曾有如下追述：“张副司令汉公再四进谏，垂涕陈词，终以成见固执未蒙采纳”。西安方面和蒋介石的矛盾逐渐表面化。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和东北军、十七路军方面重要人物云集西安。南京方面要员有：内政部长蒋作宾，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禁烟总局秘书长李基鸿，军事学家蒋方震，豫鄂陕边区主任陈继承，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军政部次长陈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中央委员邵元冲、张冲，还有钱大钧、邵存诚、毛庆祥、郭寄嶠、龚理明等人。西安方面除张杨外，还有：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陕西绥署特务一团团长孔从洲，以及东北军高级参谋董英斌，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等。在双方政治意见上的冲突无法化解的时候，双方要员聚集、研究对策，说明西安政治空气非常紧张，矛盾陡然激化。

在这种形势下，张杨确定的“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发挥了作用。他们为了实现这个宗旨，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权衡轻重，决定行最后之净谏。这个宗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民意，反映了广大官兵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所以，张杨能够得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信任，发动兵谏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兵谏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二，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历史合力造成的。但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坚持“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和“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攻击西安事变，诬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是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情上是万无可宽恕的”<sup>⑨</sup>。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利用这种舆论，主张调动军队，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阴谋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何应钦表面上摆出一副救蒋的姿态，致电张、杨二将军，要求限期交出蒋介石，声称：如不交出蒋介石，“必率全军指日西上”<sup>⑩</sup>。12月16日，在何应钦的操纵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确定：“一、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有任宣慰西北军民”<sup>⑪</sup>。17日何应钦通电就讨逆军总司

令职，筹组讨逆总部<sup>②</sup>。并不顾宋美龄的阻拦，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所谓讨伐令，叫嚣“扫荡叛逆，以静凶氛”<sup>③</sup>。他调兵遣将，指挥中央军向西急进，还派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轰炸渭南、三原等地。由于中央军向东北军、十七路军步步进逼，使国内出现了极为紧张的形势，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形势下，新的内战能不能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杨对事态的态度。如果他们对南京方面的“讨伐派”针锋相对，新的内战就可能发生。然而，张、杨虽然以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但却始终避免同南京方面发生武装冲突。张学良、杨虎城在17日再致阎锡山电中把他们的思想、愿望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电文写道：“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sup>④</sup>。他们不仅有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正义的主张，而且还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付诸实施，力持和平。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杨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大主张，其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此后，他们一再呼吁避免内战。12月14日，张学良在广播词中强调：“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15日，杨虎城在广播词中也强调：“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是抗日，不是内战”。16日，张学良又派秘书长吴家象发表广播讲话，重申张杨的主张，即：“反对消减实力的残酷的内战”。不难看出，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张杨的意向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为了抗战事业，为之争取的首先是实现国内和平。

其次，在何应钦发布讨伐令，部署“讨逆军”向西急进时，突出地表现了张杨力持和平的态度和立场。何应钦派遣军事要员飞抵洛阳，部署内战军事，张学良不得不电令东北军各部开赴反讨逆军事前线待命。电报命令：“此间派军队甚急，仰将所部主力迅先轻装星夜急进，务将每到达位置，限宿营后迅速具报”<sup>⑤</sup>，十七路军也作出相应的部署。同时，张学良致电何应钦，谴责他“西入潼关”，“肆行轰炸”，“动干戈”，“起内战”。张将军坚定地表示：“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张杨调动军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军事上战胜何应钦，争个高低，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以一定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制止何应钦的进攻，达到“内求和平”的目的。所以，张杨的军事调动和部署始终是被动的、防御的，不是主动的、进攻的。因此，尽管何应钦“动干戈”，寻衅挑畔，但大规模的内战始终未能发生。

再次，张学良将军陪蒋介石赴南京后，蒋介石不但在南京软禁了张将军，而且还调兵西进，分五个路军和六个纵队对西安采取包围姿态向前推进，在华阴、华县一带造成了爆发新内战的危险形势。这时，杨虎城将军成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最高统帅。他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虽然有过摇摆，但总的说来还是坚持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原则。所以，尽管主战派给他施加压力，与他纠缠，他还是毅然领衔于2月4日发表了《和平宣言》，重申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宗旨，他在宣言中写道：“此间去年‘双十二’之事，旨在对内求和平、对外求抗战……盖‘双十二’之举，原期永息内战，一致对外，谁复愿以对外之力量，供对内之牺牲。”<sup>⑥</sup>他为了顾全大局，在种种条件的制约之下，接受了南京方面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的有关规定，东北军东开，十七路军重新编制，这样，西安事变善后也终于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所以能得到和平解决，除了张杨坚持“内求和平”的宗旨外，还由于他们正确地

解决了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因为，尽人皆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以武装的方式在西安扣留了南京政府的委员长蒋介石及其随行的要员后，使西安顿时变成南京方面公开的敌对的势力。这时，西安方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怎样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西安事变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发生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张杨“内求和平”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如果处理得当，就可能避免内战，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张杨二将军看到了处置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结局的影响，所以捉住蒋介石后，立即发表了对时局通电，其中明确提出了对蒋介石处置的原则。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事变中，他们向外界反复宣传这个原则，如张学良致孔祥熙电，申明对蒋介石“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张学良、杨虎城致冯玉祥、李烈钧电，声明“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张学良、杨虎城致程潜、唐生智电也表示“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这个原则反映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张、杨“兵谏”，是他们拥蒋的继续。他们兵谏不是与蒋介石争权，不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也不是要伤害蒋介石，损害蒋介石的威信，而是为了抗日。所以，他们和事变前一样，仍然拥蒋。因为他们认为，就蒋介石的威望和才能讲，是领导全国唯一的人物。不把他争取过来，全国性的抗日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因此，张学良布置捉蒋任务时，强调不能伤害蒋介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突然去向不明，张学良焦虑万分。他在指挥部对两军将领和幕僚们说：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杨虎城在广播词中也表示：“一二一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sup>②</sup>。蒋介石羁留西安期间，张杨对蒋仍以委员长相称，道惊致歉，执礼甚恭。

当然，这时的拥蒋与事变前的拥蒋也有所不同，即蒋介石暂时失去了自由。不是张杨服从蒋介石的剿共命令，而是蒋介石要接受张杨联共抗日的主张。正如张学良将军对总部全体职工训词中所说：“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sup>③</sup>显然，事变后拥蒋有了条件，即蒋介石必须“主持抗日工作”。张学良给宋美龄的电报也说：“倘介公实行积极抗日，良仍当竭诚拥护”。

2. 张杨兵谏是他们多次净谏，逼蒋抗日的继续。事变前，张杨为了联共抗日，对蒋介石净谏已经到了“用尽心机”、“唇敝舌焦”的程度，但均被蒋介石拒绝。他们为了使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不得不实行最后的净谏。张学良说这是“不得已而行权”<sup>④</sup>。由于他们采用兵谏的形式，使蒋介石脱离南京政府“群小包围”，在西安又暂时处于失去自由的状态。迫于形势，蒋介石就有可能改变以往的错误。历史雄辩地证明，恰恰是张杨用兵谏的办法逼蒋抗日，才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

3. 拥蒋、逼蒋，只要蒋介石改弦更张，答应八项条件，必然放蒋。就是说，“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原则包含着放蒋的思想。张杨在一些电报中说得更加明确，蒋介石在西安是“暂留”、“暂住”。既然是“暂留”、“暂住”，就不是想长期将蒋介石扣留于西安，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正因为张杨捉蒋时就有放蒋的想法，所以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后，他们便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还毅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4. 这个八字原则特别是对蒋介石“保其安全”，有利于分化南京政府中英美派和亲日派，促使英美派迅速地转变到抗日战线方面来；有利于击破南京政府中讨伐派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以的阴谋，使何应钦不敢轻举妄动，内战得以避免。西安方面再三声明对蒋介石“绝对不能稍加危害”，蒋介石在西安“极为安全”，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是西安方面求得“对内和平”的一个卓越的策略。

张杨两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领导发动西安事变是非凡的行动，而且在事变过程中提出了具有远见的八字宗旨，包含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加之当时各种因素的作用，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sup>⑳</sup>。张杨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要充分肯定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贡献，充分估计他们在事变期间提出的八字宗旨的历史作用。

### 三 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既然张杨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主要作用，那末，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期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杨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象中国共产党那样，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指导原则。换言之，他们没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明确方针。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西安事变期间张杨发表的声明、通电、讲话、都没有提到和平解决的方针，甚至连“和平解决”这四个字也找不到。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中央还派遣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其活动影响了西安变变的进程，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中共中央的历史功绩。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毛泽东说得好，他说：“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sup>㉑</sup>。毛泽东这段客观的叙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是“调停”宁陕双方的矛盾冲突，实现国内和平。用周恩来当年致张学良信和致蒋介石信中的话来说是“尽力调处”。因此笔者仍坚持1980年出版的拙著《西安事变史话》一书序言中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方针，而且“协助”张杨妥善地处理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和南京间是处于矛盾、对立中的双方。当时，缓解双方的矛盾，消除双方的对立状态，避免内战，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积极调停。为了尽快实现党的方针，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态度及其处置办法也迅速地作了调整，由主张“审蒋”变为“保蒋安全”以至主张“放蒋”，对谈判问题也由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以南京政府为对手）变为以蒋介石为对手。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期间所采取的这种方针和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旨在通过和平解决事变和释蒋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中共代表团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推行深入细致的调停工作，特别是由于周恩来“施展绝妙的才能”<sup>㉒</sup>，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17日，中共中央所派出的代表团到达西安时，西安和南京处在极端的对立状态之中，许

多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如，国民党中英美派想营救蒋介石，必须满足张杨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条件；张杨要达到联共抗日的目的，必须由蒋介石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联共抗日的政策。但这些还都是悬案。所以，中共中央所派出的代表团为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就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张杨和蒋之间进行调停，以平息争端，团结抗日。

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和南京间进行调停，不是不偏不倚，而是站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

南京方面，国民党内部存在着抗战与妥协，英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西安事变发生后又产生了“讨伐派”与“政治解决派”的矛盾。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南京转向抗日的立场，中共中央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中央书记处分别致电西安、天津、上海党组织，指示他们号召人民起来，推动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欧美派、元老派、抗日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推动宋子文、孔祥熙、孙科、蔡元培、李石曾去争取英美法三国谅解西安事变。15日、18日、19日连续发表通电，谴责“讨伐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时声明，南京如进攻西安则蒋的安全无保证，以此来牵制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20日，宋子文到达西安，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说服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

西安方面，由于张杨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所以他们提出的“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完全一致。事变期间，《双十二事变在陕北》一文的作者，就敏感地抓住了西安事变同党的统一战线的关系，对比分析了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同瓦窑堡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文件的异同点，然后得出结论说：“这次惊天动地的双十二事变，虽说发生在西安，归根说起来早在陕北酝酿着，简直可以说发生在陕北。”<sup>③</sup>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也认为张杨发动事变是“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所以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均给张杨以实际的积极的援助。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安方面，提醒他们注意南京方面的军事动向，特别要注意潼关方面的樊嵩甫和咸阳方面的万耀煌。为了对付何应钦，建议东北军愈集中愈好，但却不可丢掉兰州。12月15日、18日、19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通电，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赞扬他们是“抗日救国之贤豪”。不久，红军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驻三原、泾阳、商县一带，准备配合张杨部队回击“讨伐军”，制止内战。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对张杨起了壮其胆，鼓其气的作用。

在张杨与宋氏兄妹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支持张杨八大主张，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同张杨采取一致的原则立场。经过两天谈判，周恩来因势利导，促成西安和南京双方达成六项协议。蒋介石“全面采纳”“救亡要图”<sup>④</sup>，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工作卓有成效，说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宋美龄也承认，周恩来是“有力分子”，“甚明大体”<sup>⑤</sup>。

张学良陪蒋赴宁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分裂。在如何对待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上，围绕和与战的问题，少壮派和元老派观点对立，矛盾尖锐，以至发展到少壮派采取非常手段镇压主和派，使东北军面临自相残杀，分化瓦解的危险局面。杨虎城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也摇摆不定，时而主和，时而主战。在这严重关头，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精心研究了东北军和



十七路军的状况、处境及其变化的趋势，对他们因势利导，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坚持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原则。这不仅帮助东北军维护了团结，而且继续贯彻了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方针。坚定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和平解决的信心。国民党不得不公开承认：“共产党首领周恩来在西安极为活动”。<sup>⑬</sup>

综上所述，可知：第一，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以后，张杨仍然是事变的领导者。中共代表团是陕宁对立双方中间的调停者。第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是西安事变重要问题的决策人。张学良在西安期间，张学良是中心人物。张学良陪蒋赴宁后，杨虎城成为主要人物。周恩来在西安始终是处于协助张杨处理事变善后的地位。第三，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经过长期酝酿，不是没有计划，不是束手无策，他们提出的八字宗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终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制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 注释：

①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2卷512页）。

②《盛京时报》（1927年2月19日）。

③张学良1931年9月20日致张作相等电。

④《杨虎城泣告全国》（载1931年9月24日《民意晚报》）。

⑤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37年1月8日《解放日报》）。

⑥张学良1936年6月22日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刊登于1937年1月5日《解放日报》）。

⑦张学良《请缨抗敌书》（1936年12月15日《解放日报》）。

⑧杨虎城《告民众书》（1936年11月28日《西京日报》）。

⑨《新北平》（1936年10月5日）。

⑩转引自《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1936年12月15日《解放日报》）。

⑪《张对所部讲话》（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⑫台湾版《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109页。

⑬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⑭1936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

⑮193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⑯1936年12月23日《解放日报》。

⑰1937年2月18日《桂林日报》。

⑱《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3日。

⑲引自《西安事变与勘乱》。

⑳引自《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6日）。

㉑引自《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专编》（上）第509页。

㉒㉓引自《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7日）。

㉔引自《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135页。

㉕引自《新北平》（1936年12月17日）。

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集第142—143页。

㉗引自《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㉘引自《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㉙引自《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㉚《毛泽东选集》第334页。

㉛《毛泽东选集》第228页。

㉜引自《朝日新闻》（1976年1月9日）。

㉝《学生呼声》第二期。

㉞《函各县长述双十二事件之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号以今后施政之方针》（1936年12月29日）。

㉟《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47页。

㊱引自《申报》第二卷第四期。